

钱锺书翻译观的“新修辞”诠释

福建师范大学 秦亚勋 长安大学 杨雯琴

摘要:在当代西方“新修辞”思想观照下,一贯被视作钱锺书翻译思想核心的“化境”说,实际上只是对“化”字断章取义的“修辞嫁接”。本质上作为修辞“行为”的翻译活动总是与一定的“修辞情势”密不可分,翻译活动理应遵守特定“修辞情势”下“因地制宜伦理”的价值观念。将“化境”说视为钱锺书翻译思想的核心有悖其务实翻译策略的“欲取姑予”这一修辞特质。然而钱锺书本人的“修辞失算”对学界这一普遍误读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键词:化境;修辞行为;欲取姑予;修辞失算

作者简介:秦亚勋,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和比较修辞研究。电子邮箱:qinyaxun@126.com 杨雯琴,讲师,主要从事认知理论、心理语言学研究。电子邮箱:yang_wenqin@163.com

1 引言

近年来,围绕钱锺书先生翻译思想开展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其中,钱氏着力探讨翻译问题的代表性篇章《林纾的翻译》一文,因首倡“化境”说之故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审视与阐发(以下简称《林译》)。罗新璋(1984: 19)在《翻译论集》序言中,曾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作为探明中国传统译论发展轨迹的基本“路标”。“化境”享有地位之隆,由此可窥一斑。然而,细察之下,《林译》一文隐在的问题颇多。比如在认真审视其文本内容与组织结构之后,我们发现:“化境”实乃钱氏推出“译”之“虚涵数意”时的虚晃一枪;作为“虚涵数意”统摄的子方面之一,“化境”在该文中其实并未被赋予太多的笔墨;钱氏在正文里予以反复申说的乃是“译”的“讹”、“媒”和“诱”等方面,尤其是关于“讹”的论述几乎占了全文大半的篇幅,这一曾被浓墨重彩铺叙的事实与寥寥数笔即声望日隆的“化境”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令人不无困惑。到了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钱氏在修改《林译》一文时,又将“化境”从翻译“标准”提升为翻译“理想”,译界对此虽多有论争,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单就这些事实而言,“化境”说依然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考虑到钱氏在《管锥编》开篇第一则“论易之三名”即奠定了“虚涵数意”作为其总体治学主张的观念基础,本研究拟从对《林译》一文的解读入手,统以西方“新修辞”视角,先对“虚涵数意”的“小修辞”功效作一剖析,再将“化境”归回“虚涵数意”,对“虚涵数意”的数个方面一并予以重新审视,并结合钱氏整体的治学思想,对学界通行的“化境”说予以修辞学意义上的盘点和重释。

2 “虚涵数意”:《林译》之“断章取义”

就中西修辞传统均有系统著述的“小修辞”也即修辞格而言,钱氏长于旁征博引、妙喻迭出,是钱学研究领域业已达成的广泛共识。经由钱氏反复实践与概念提炼,已被演绎为一种独成一格修辞手法的“断章取义”即是一个明证(张炼强,1993)。有鉴于此,钱锺书和陈望道被一道列为“双峰并峙”的修辞学大家(高万云,2006:11)。钱氏不单善于通过“断章取义”的手法在文艺作品中大量铺陈已见,也常将该手法不着痕迹地融进学术观点的阐发当中。《林译》中的“虚涵数意”即是一例。

《林译》一文开篇即对“译”作了训诂解析,指出“囿”就是“译”,即如“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而“譌”、“讹”、“化”和“囿”则是同一个字。钱氏据而得出结论:“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都一一透示了出来。钱氏紧接着顺水推舟,很自然地带出了著名的“化境”一说。从读者的角度看,“译”的训诂如何并非该文读者的主要关注点,其功用在于增进了读者的见识和读下去的兴致。而对于钱氏来讲,对“译”进行训诂考证也并非出于对该词词源学上的兴趣,而是为了引出“囿”一字以统摄意义原本不甚相关的其余诸字,以便于下文将各项作为翻译的必要组件加以阐述。这一独树一帜的行文技法在钱氏著述当中屡屡被巧妙运用。钱氏本人对“断章取义”的修辞功用曾做过明确肯定:“足征‘断章’亦得列于笔舌妙品,善运不亚善创,初无须词尽己出也。”(钱锺书,2007a:371)钱氏重视词语在运用时出现的转义现象,在他看来,既可以不用本义而用转义,也可以不用转义反用本义,词的本义不一定就是它实际使用的意义,所以对词语的意义的理解,不能“以字源为逋逃所”,不能“不

原大理,惟字是求”(见张炼强,1993)。事实上,《林译》一文中“诱”、“媒”、“讹”、“化”诸字使用的都是经历了历时转义过程、为钱氏所处时代普遍接纳的通用义解,较其古义已有微妙变化。但以它们的训诂渊源入手,大大方便了下文的相关论述,更为“讹”提供了充足的“证当”(justification)。“化境”的拈出则完全是钱氏“断章取义”的修辞惯技:“化”与“囿”音义相同,“化境”则始自佛经,渐成为传统画论、文评的常用语,已与“化”无关(杨全红,2007)。作者“化”与“化境”的“修辞嫁接”,意在抛出一个设计的靶子,借而为下文大张旗鼓地论述“讹”等方面的必然性备下一个巧妙的助力点。

3 关于《林译》一文核心的再思考

一直以来,译界惯将钱氏的翻译思想归入传统译论序列。其实,如果说传统译论以“原著中心论”、“作者中心论”等来严格要求译者恪守“隐形人”规则(仲伟合,2006),那么钱氏《林译》一文很大程度上属于“译者中心”的翻译视角,大体上已经疏离了传统译论的轨道(崔永禄,2006)。譬如,“虚涵数意”统摄的几个方面和“信达雅”、“神似”等在文字表述上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第一,后者均针对译文,前者则以译者为论述对象;第二,后者均为评价译文水准的形容词,前者则大都是对译者翻译“行为”及效果进行界定、描摹的动词;传统译论要求译者的译文必须以“信达雅”或“神似”等为标准或目标,关注的是译文而不是译者,而钱氏则着力以译者的翻译“行为”为轴,突出其与源文本和译文之间的互动、戏动过程。这一倾向也与当代西方修辞视野下对翻译活动的新认识暗合。

20世纪美国修辞思想大师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 1969: 262)的全部修辞思想体系建基于“运动/行为”(motion/action)的基本区分,将人类话语的意义生成系统始终置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或修辞情势(rhetorical situation)之中。这就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具体文本都有其相对稳定的语境模式(mode of contextualization)(刘亚猛,2006)。理论话语是特定文化历史语境的话语构筑,而话语构筑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隐藏着复杂非话语因素交织互动的修辞行为(rhetorical action)过程。因此,德国功能学派学者贾斯塔·霍尔兹-曼塔里(Justa Holz-Manttari)曾提出以一个新词“移译行为”(translatorial action)来代替“翻译”(translation)(谢天振,2001)。这一措辞置换便颇值得我们在“新修辞”学意义上稍事玩味。霍尔兹-曼塔里清醒地把翻译界定为“行为”,对我们有着不同寻常的启示:“人”是任何“行为”的唯一主体,翻译“行为”作为一种修辞“行为”

又总是与一定的“修辞情势”密不可分,从而积极凸显出翻译活动理应遵守特定“修辞情势”下“因地制宜伦理”的价值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钱氏对“虚涵数意”的界定和阐述与霍尔兹-曼塔里异曲同工。

如果说“虚涵数意”作为“断章取义”这一独特辞格在“小修辞”层面的使用体现了钱氏对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独特贡献,那么我们进一步认为,“虚涵数意”统摄的“诱”、“媒”、“讹”、“化”诸方面则客观、全面地折射出了作为人类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所可能会采取的“修辞行为”。与此同时,考虑到翻译活动不能不服从于人类的各种实际利益的考虑和需要,绝非发生在文化真空里的纯语码转换,钱氏对译者与源文本和译文之间存在的种种“行为”关系又作了明显有着实质不同和侧重的裁定。也即是说,“诱”、“媒”、“讹”、“化”等几方面因《林译》所处的特定“修辞情势”,而在论述中分据着迥然有异的位置。崔永禄(2006)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钱锺书在对翻译作品进行评价时采取的眼光其实是非常现实的,并认为在钱氏该文中,“媒”和“诱”的地位更为夺目,尤其是“讹”在全文得到详尽论述,被赋予了中心地位,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化境”说甫一露面,即因钱氏实乃有为之的“定调太高”被迅速解构。这一处理有着丰富的修辞内涵:由作者先行推出一种说法,随后即实施自我解构,看似“没事找事”的多此一举,实为表明作者考虑问题周密,预拆异见者可能瞅准空当随时发难之后台的修辞策略。文章自此可以毫无负担地将其撇开,转到真正重要的论述内容上来。与此同时,其余诸方面则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为林译之“讹”寻求开脱的遁词。其实这也暗合“虚涵数意”中“虚”的义涵:受制于某一具体的“修辞情势”,数个意义并非都有“激活”的可能或必要。

4 “打通”观与翻译策略的修辞肌质

4.1 自设之“悬鹄”:钱氏“化境”说的修辞肌质

钱氏治学兼备中西,博洽通识,乃世所公认。要准确理解钱氏的翻译思想,不能光在字面上寻找答案,就译论译。事实上,他对于翻译的看法深深植根并服务于他个人的总体学术理念和实践。他在《谈艺录》序言中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后来在给友人郑朝宗先生的信函中,钱氏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结为“打通”二字(季进,2002:170)。在钱氏看来,“不同文化、不同话语、不同学科之间,无论古今中外,都有可能殊途同归,昭示出人类共同的

诗心文心”（同上，2002：170）。钱学界对此学术理想历来深表赞许，并将钱氏的治学成就引为“打通中西”的典范。然而，正如钱氏指出，历代袭从西晋杜预之说，将“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奉为《春秋》撰著五大特点，实在是一种误解。这五大特点“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殫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只是“史家之悬鹄，非《春秋》所树范”。（钱锺书，2007a：268）换言之，其仅仅是一种起着鼓舞、激励功用的修辞策略而已。这实在是一个异常清醒的认识。这一修辞策略的定位不光针对《春秋》，也同样是钱氏为自己的学术实践提出的一个努力路向，钱氏不自满的态度是学界公认的事实。然而我们注意到，不少研究倾向以钱氏散见于《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的译笔为支撑，论证钱氏的“化境”说。这既与我们的文艺理论里惯有的“学无止境”、“艺无止境”等学术常言相左，更不符钱氏的基本主张。“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再好的翻译总有一天会被逾越，完美的翻译从来都只是译界一个美好、天真却失之无谓的学术谈资而已。如若我们转而将钱氏的学术实践奉为“打通中西”的楷模，将钱氏的翻译实践和“化境”这一翻译理想轻率地对等起来，无疑犯了“误将悬鹄作树范”的毛病，既有悖常识，有失学术严谨，更可能累及钱氏本人的学术声誉^①。“宗师之‘反倒’，每缘门徒之‘礼拜’”，“受累不由于谤而由于誉”（钱锺书，2007a：577）。这些夫子自道的警醒之言，颇可资后人在研究钱氏学术思想时自我观照及诫示之用。

4.2 “欲取姑予”之归化：钱氏翻译策略的修辞肌质

钱氏“打通”中西、融会古今的治学气魄毫无例外地也体现在了他对翻译的关注和看法上。要真正沟通中西，打破语言障碍是首要任务，而打破语言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翻译。钱氏“夫‘译’一名‘通事’，尤以‘通’为职志”的论述，虽“著语无多”，却是“谈言微中”（罗新璋，1990），在他眼里，翻译的目的也正在“打通”。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在学术实践中，钱氏并非罔顾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具有敏锐“学术修辞”意识的行家里手。其不可能认识不到，通过翻译“打通”“道术未裂”的中西之学、“昭示出人类共同的诗心文心”的学术理想，一旦坐实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大语境也即修辞情势下，就非得采取能与之兼容的方法策略分步骤走不可。

在林纾的时代，对于大部分杜门不出的普通国人，西学不啻是一种极度陌生而疏远的存在。先知先觉的文化先行者若想尽快扭转这一状况，第一步就是将国人“调适”到愿意乃至乐于接受西学的文化心理状态。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

要采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修辞策略手段(刘亚猛,2008:346)。原因有二:一是普通国人不懂西文,需要以翻译作为引介的主渠道;二是唯有以“欲取姑予”的策略,才能使原本对西学并不熟悉也谈不上有多少期待的国人萌生接触的意愿。“欲取姑予”体现在翻译策略上,就是“归化”:通过西学与传统文化相似处的比附,或甚至故意借“明知故犯”的“讹”以消除在当时当境明显可能引起不适或排斥心理的内容,均不失为可行的权宜之计。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林译》对林纾翻译实践的肯定,以及钱氏对林纾后期因热情大减致使译介成效下滑的失落情绪。

建国后,多年的兵燹之患让国内文化事业欲振乏力,复苏举步维艰,相较于林纾时代,滞后于西方的局面并无显著改观。成文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林译》,创作动机与此或许不无干系。继续保持借镜西学、壮大自我而不为西学牵制依然为势所需,这一点在钱氏本人后来的学术实践中便有着直接体现。以《管锥编》为例。该著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典雅文言写就;二是以中国传统文论条目为纲联缀全书,绝大部分所引的西学内容纵然林林总总,却无不是在为钱氏基于中国文化的见解“做注”。以钱氏置身的修辞情势观之,这一著述体例便于以我为主引介西学,并最终为我所用,融入中国的文化血脉。翻译策略上,钱氏的译笔均呈文言语体,文字组织灵活多变,语言风格有如行云流水,毫无阻滞突兀之感。这些均是其“归化”手法的有力佐证。对于能更好接通中国文化的创造性之“讹”,钱氏更是勉力亲为。在《林译》文中,钱氏写道:“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钱氏之学睥睨中西,眼高手高,在翻译中自信有“点铁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橘为枳”之能。偶尔仿效下“小孩子的放肆率真”和林纾“大胆放手”的翻译风格也正是钱氏翻译实践的真实写照。

4.3 “化境”说:钱氏之“修辞失算”

前文曾指出,在《林译》一文里,钱氏申述的要点不在“化境”而在“讹”。事实上,钱氏本人对于学界将其翻译思想笼统冠名为“化境”说的做法,并不见得有多大认同:《林译》一文对之着墨不多,且很快在下文痛快地作了自我解构;再后来,钱氏在八十年代修订《林译》一文时,将“化境”从翻译“标准”提升为翻译“理想”,依笔者来看,这一易笔大大弱化了将“化境”作为翻译实践追求目标的阐释,与成书于七十年代末的《管锥编》在学术思想表述上有着高度的内在统一,用意即在诫示后来者摒除将“悬鹄”误作“树范”的曲附习气。循着钱氏这一翻

译理念的心路历程,我们也不难认识到,“化境”说完全谈不上代表钱氏的核心翻译观和立场,甚至因为该说法的误用、滥用,很大程度上已经乖违了钱氏的基本学术主张。如果继续将“化境”说视为钱氏理所当然的核心翻译思想,或者即便是在呼吁要特别关注“译”所蕴涵的一脉相通、彼此相连的“虚涵数意”,却仍然将相关讨论集合在“化境”门下,都不免误人心目,转移读者受众的视线,有碍于读者准确把握钱氏的翻译思想。用“化境”说以求收一言蔽之功效的处理,便宜之余却已然偏离钱氏本意。这也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当中,如何让文字表述和表述对象保持逻辑一致,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修辞问题。无论是研究中不及细察的无心之失,还是虽已看到钱氏论述之“重”不在“化境”,却出于学术惯性依然袭用“化境”说统括钱氏的翻译思想,既是对钱氏的不公,也可能致使后来学人因先入为主倾向,误解钱氏的翻译思想。

然而,钱氏本人亦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钱氏在《林译》开篇借许慎的训诂,将翻译“虚涵数意”的“诱”、“媒”、“讹”、“化”数方面尽数引了出来。然而钱氏并未严格按照以上各方面的本来次序展开讨论,而是径直绕过了“诱”、“媒”、“讹”,让“化境”占了言说的先机。从受众的阅读接受效应来看,虽然钱氏紧接着便不动声色地令其作了自我解构,并在下文几乎对之只字不提,却并未淡化受众对它的瞩目和偏爱,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研究者普遍以“化境”为钱氏翻译思想的核心,并敷衍为“化境”说。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出现这一修辞效果,与两个原因不无干系:其一,“化境”流通甚广,是中国文艺创作理论修辞的“常言”(commonplace),为各行当人士所偏爱,迹近于“技艺高超”的代名词;其二,自《孝经》等重要典籍首开“开宗明义”文法的先河之后,后世广为效法,久而久之对民众“表里如一、开门见山、开篇破题显志”阅读期待的型塑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然而钱氏学贯中西,其为文之法早已兼备中西之长,往往在不同的写作技巧间自如地腾挪辗转,变化万端。要知道,文化心理和文化范式乃一文化体系最难移易之所在,钱氏原本设伏委婉机巧的修辞盘算,无疑因受制于目标受众的阅读心理定势而未能被准确辨识。即便钱氏后来特意对相关文字表述作了更改,也为时已晚,奏效甚微。况且,仅仅更替个别字词,而篇章组织结构依然如故,于转变受众的阅读期待并无大补——或许这也是部分学界同人在阐释钱氏这一易笔时,往往仅着眼于“标准”与“理想”字面语义差别的深层原因。

概而言之,如果以受众的阅读效果为准绳,《林译》一文在泽被深远的同时却也埋下了被误读曲解的“谬种”。“化境”说的锋芒遮蔽掉了“虚涵数意”的丰富义蕴,使得“虚涵数意”的其他要素始终未能被公平正视。钱氏精雕细琢的“修辞盘算”反倒令其始料未及地以“修辞失算”告吹。当然,我们无意在钱氏与受

众之间分是非、判高下。中西文化之差异深透肌理,要自由摆渡中西文化两岸之间,与内在组构深具异质性的读者受众群体进行透明化沟通,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即令修辞大家如钱锺书,也同样有其力所不逮的时候。

5 结语

本文统以西方修辞视角,对《林译》一文进行了重新解读,并结合钱氏的治学理念,力图澄清近来关于钱氏翻译思想存在的认知迷误,得出了以下初步的结论。首先,“化境”说只是钱氏《林译》一文中“虚涵数意”并不重要的一意而已,其出现是出于服务于全文谋篇布局的修辞发明需要;其次,“诱”、“媒”、“讹”、“化”诸动词的选用与西方修辞学大师伯克的思想不谋而合,这告诉我们:翻译也是一种复杂的修辞活动,以修辞视角重新看待翻译活动,会让我们产生截然不同的全新认识。接着,我们略微考察了钱氏的治学策略,期望学界对其“创造性之讹”的归化翻译策略体现出的“欲取姑予”修辞意图予以关注;最后,我们特别指出,“化境”说之所以一直以讹传讹而未被察觉纠正,部分根源在于钱氏本人的“修辞失算”,没有充分考虑到受众因“化境”这一语汇可能调动起的庞大文化心理资源。

注释

① 如前文以及下文所示,钱氏既无意详述“化境”,更无意于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以此为准绳。他的翻译实践也是以鲜明的现实因素为导向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其“创造性之讹”的翻译策略上。

参考文献

- Burke, K. 1969.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陈大亮, 2006, 重新认识钱锺书的“化境”理论,《上海翻译》(4): 3—8。
- 崔永禄, 2006, 传统的断裂——围绕钱锺书先生“化境”理论的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3): 49—51。
- 高万云, 2006,《钱锺书修辞学思想演绎》,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 胡平生、许颖、徐敏, 2009,《孝经·地藏经·文昌孝经》(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 季进, 2002,《钱锺书与现代西学》,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刘亚猛, 2006, 从“忠实于源文本”到“对源语文化负责”: 也谈翻译规范的重构, 《中国翻译》(6): 4—8。
- 2008, 《西方修辞学史》,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罗新璋, 1984,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 载罗新璋等(编), 《翻译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19。
- 钱锺书, 2002a, 《七缀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2b, 林纾的翻译, 载钱锺书(著), 《七缀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7—114。
- 2007a, 《管锥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7b, 《谈艺录》,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谢天振, 2001, 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 《中国翻译》(4): 2—5。
- 杨全红, 2007, 钱锺书翻译思想研究, 博士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 袁荻涌, 1994, 林纾的文学翻译思想, 《中国翻译》(3): 44—46。
- 张炼强, 1993, 彼此系连, 交互映发——钱锺书修辞理论和修辞实践管见,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29—35。
- 仲伟合, 2006, 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 《外语与外语教学》(7): 45—49。